

战后日本对东亚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代性”思考

董悦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自1942年起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的论述与不断重述,使得日本通过对东亚“现代性”问题的不断追问,进而表现出其对本国乃至整个东亚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普遍思考。对于“超克”的对象的“现代”,不仅表现出了与时局变化下寻求本国本位及发展目标相呼应的流变,且其方法论视角下对“中国”与“日本”的解构和建构,使得在东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超克现代”成为可能。这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近代的超克”;“现代性”;子安宣邦;加藤周一;东亚

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外部”世界霸权体系的重组而渴望跻身其中的“自身的欲望”,与“内部”工业化的完成而显现出的对“故乡”的丧失和对“现代都市”的怀疑,共同构成了当时日本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思潮^[1-58]。这种“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格局,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见端倪,直至1942年召开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被正式确立,即转变为以“超克”西方为宗旨的,对“脱亚入欧”的“文明开化”道路的再审视,和对“东洋”、“日本”文明传统的再评估。而这一战时体制下具有浓厚色彩的意识形态论,在1959年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而被竹内好等日本思想家又一次提起,此后成为丸山真男、沟口雄三、子安宣邦、加藤周一等日本众多思想家和学者对“近代的超克”之议题不断重述、论辩的基础。

一、近一个世纪“超克”视角下的“现代”论发展演变

关于“超克”之对象的“近代”(“现代”),董炳月(2017)在《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一文中对“近代”一词所指含义进行了详实的考察。对于在日语和现代汉语中所指不同却概念有所交叉的“近代”,在时间维度方面,前者所指的“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与后者所指的“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二者在开始“现代化”这一“属性”上出现了交叉点,因此“近代的超克”这一议题中的“近代”应属于“属性”性质的“现代”,从而解决了学术界在“近代”与“现代”的指代问题上始终存在的概念错位现象^[147-149]。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自1942年起在不断被重述的“近代的超克”论中,随视角与时代背景的不断转变而演变的中日两国学界对于“近代”抑或“现代”的表述中,所存在的根本属性的同一性。

但是,面对同属性的“现代”,作为“超克”的对象,对其问题的本质性探讨,却表现出了与时局变化下寻求本国本位等发展目标相呼应的流变。

作为战时体制下国家与民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二战期间所批判的“现代”,即“超克”的对象,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下“文明开化”的现代化道路,即所吸纳的西方文明在“法国革命后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铃木成高)”,也是“竹内鲁迅”象征的“东洋的抵抗”所“抵抗”的西式“原现代”。而“超克”后所追求的“现代”,是寻求日本在世界道德新秩序下的精神文明的不断诉求,其实质是以大东亚战争为幌子的、对日本在世界霸权地位中的反复确认。

战后,盟军的对日占领、《美日安保条约》及其日后安保斗争下美日战后关系的另一层“深化”,使得日本在对国家主体和主权的认识上不断推进,也使得日本在对“超克”对象“现代”的认识上,表现出对思想内部的反思,及其与历史间相互关系的对比。是对“物质文明哲学”的再度批判,也是对“精神文明哲学”的再度追求的全面开启。竹内好在一方面批判继承了战时的“超克”论的基础上,指出应“超克”一味模仿西欧的缺乏主体性的“现代日本”。丸山真男从战中“幕藩体制对主体人格的制约”到战后对“天

皇制及其思想和社会结构病理”的批判性转变,展现出的是对“压制主体性思维的思想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尽管两人在方法论以及对“传统”批判性继承的视角上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对日本“主体人格”和“主体性思维”的诉求,强调日本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使得对“现代”的诉求更加趋于对与“物质文明哲学”相对的“精神文明哲学”的追求^[9]。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在世界霸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对于“现代”论题的把握将视点置于“漫长的二十世纪”和“即将到来的新二十一世纪”的交叉的十字路口。回首过去,在对人的“自主能动性”之“现代性精神”追求的阐述中,一以贯之的是“东洋”对“西洋”的视点和逻辑,其中不乏包含着“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调。其希冀不断“超克”的“现代”,不乏包含着西方文明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各种“现代性”话语阐述。反欧洲中心主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诸论调,最终不免流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关于独特东方的他者化认识论”,即“普遍性的西方/世界”,使得“‘近代的超克’的历史实践,依然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世界史的变奏之一”^[49-116-117]。在面对诸如此类的“现代性”的危机化表述下,子安宣邦与加藤周一等人站在世界史的他者视角,立足于日本近代文明史的外部反观“日本”与“现代”,试图弥补“超克论”一直以来缺失的“对东亚各国主体性认可的他者视角”^[5]。

二、“现代的超克”之方法论的“中国”和“日本”——以子安宣邦和加藤周一为中心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近代的超克”之论辩中涌现的众多方法论,都绕不过“东亚”这一命题,而“东亚”内部存在诸种关联的“中国”和“日本”更是细化之后的本质问题,也是以“西欧”为参照的对“现代化”不断解构与建构的依据。从竹内好的“中国”,即“作为方法的亚洲”主张下建构的“竹内鲁迅”,到沟口雄三的“中国”,即“作为方法的中国”中的历史性表述,在子安宣邦看来都是相对于“方法”而存在的“实体”,成为了包含“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构式的“东方主义”西欧化叙事的表征^[50]。子安宣邦批判了其“实体化”的“东亚”,而提倡“方法化”的“东亚”,而建构出的包含“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即“作为方法的江户”,正是在这一思想下形成的解构帝国主义西欧叙事的“概念”的(“方法的”)“东亚”。加藤周一的“中国”和“日本”也是在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结构中被建构出来的。其“杂种文化论”所强调的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与对日本传统的“合理性”价值的再评估,是以否定“现代化=西方化”构式并承认“现代”在日本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性呈现为前提的^[71-291]。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超克论”中对“中国”和“日本”的解构与建构呈现出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其本质是在世界史维度下对从“日本”外部转向其内部的“传统”意义的再评估和自我意识的重构。而其内部所存在的,是在“传统”这一价值基准上作为不可分割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其外显形式是以“文学”和“艺术”作为方法的又一层表述。

“近代的超克”之论辩所涌现的众多方法论中,出现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是在东亚史抑或世界史视域下,对“文学”和“艺

术”这一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构式的、“多元化”的重述,体现的是对“传统”及本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情感的挖掘和评述。加藤周一表示:“文学是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运动,民族性也就是特殊性的一部分”,“从文学上来说,第三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从文学的特殊性向世界性运动的过程”^{[7]-446}。加藤周一所提出的“冲突与融合”的日本文学发展模式下,“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与外界交流的主体性”的辩证统一的“文化多元主义”,为日本文学和文化“杂种性”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参照^{[8]-499}。而“超克论”中,对“徂徕学”的解构与建构似乎是始终难以绕开的一个重要问题。丸山真男基于“徂徕学”所开拓的“人的主体”立场而发展的“古层”论对“文化潜意识”的“传统”的深入挖掘,与加藤周一受到“在原理的普遍性中还原时代的特殊性”这一“徂徕学”的“第二特征”^{[8]-22}的启示、对“现世主义=现在主义”的“日本人论”的批判,都旨在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从而实现“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其探讨的本质又可以回归对“汉字”这一“他者”的认识上,是对“汉语”和“日语”、“音读”和“训读”中“汉字”存在的“自觉”,是对与“中国”关系的不可回避事实的笃定与在这一事实发展下寻求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下“东亚一体论”的理解和阐述。

三、东亚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超克现代”的可能性

竹内好“现代”论的“偏离”、丸山真男“现代”论的“未竟”、子安宣邦“现代”论对“方法化”的追求、加藤周一“现代”论对“传统”的“回溯”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现代的超克”命题的各种“虚像”与“实像”在对前人的不断批判、否定以及再评估的进程中逐渐趋于饱满。子安宣邦曾充分肯定竹内创造出的“作为憧憬的中国革命”形象所代表的近代日本人思想体验的价值,其“现代论”所追问的世界史意义上的“现代”,也是20世纪东方“现代”的实现方式,“对以汉口为代表的战后世代研究者和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237-240}。但“现代的超克”在从战时为东亚战争造势到战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明治以来的普遍性问题”的过程中,渐渐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抽离出来,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普遍性”内在化逻辑中,抨击“西方的普遍性论述”,在“普遍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普遍性”的双重论调中,一边实现着对“西

方普遍性价值”的挑衅,一边造就了民族激进主义的诞生,最终只能使得“现代的超克”命题在无止境的“失败”中完成其“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4]-117}。子安宣邦和加藤周一再强调“历史问题”和“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这种“消解历史的可能性”中谋求“超克现代”的可能性,实现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突破了以往“中-日”、“东洋-西洋”的双边框架,在日本文学中加入了“第三世界”叙事的基础上,实现了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的关注^{[8]-488-489}。这种文学上从“特殊性”向“世界性”过渡的过程,即第三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7]-446},是需要世界各国相互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完成的事业。在全球性问题突出、国际情势不断变化的后疫情时代,以更加发展的眼光和更加宽阔的视野看待“现代性”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今后的未来走向,对在“东亚”建立各国长期有效的相互克制、相互协调的合作发展机制,增强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赵京华.“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J].开放时代,2012(07):55-72.
- [2]董炳月.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讲起[J].文艺研究,2017(08):146-157.
- [3]唐永亮.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辨——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J].世界历史,2017(02):59-72+157.
- [4]韩琛.近代的超克、漫长的20世纪与“竹内鲁迅”[J].学术月刊,2016,48(06):111-120.
- [5][日]子安宣邦.何谓“近代的超克”[M].董炳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6][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M].王升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7][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M].叶渭渠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 [8][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M].叶渭渠 唐月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上接第165页)

已经对“民主”的重要价值进行了强调。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使得我国公民在民主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普及就应当注重将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引导我国民众对如何实现民主、如何承担责任、如果正确行使权利等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二)建设网络政治参与以保持参与渠道畅通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也正因此,传统的参与渠道显得效率过低,手续也过于繁琐。

要解决沟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政府应将整体的工作重心放在网络政治的建设中,以信息为媒介,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创建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以影响政治过程。而针对其在目前出现的技术问题和设备问题,应主动应对以解决而非被动地接受其负面影响。如,政府可以在财政建设的过程中拨款铺设信息网络,安装电子设备。尽管在部分落后地区,信息化可能未成为刚需,但站在未来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信息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地方铺设电子设备,只会反作用于地方,加速拉动地方发展。

当然,设备的铺设和普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完成。政府不可以因为重心偏移,就彻底舍弃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在整体视角下,传统的渠道作为信息化的补充和临时的替代方案,还是有其存在与进一步改进的必要的。

(三)加速法律体系完善,强化监督意识

要给文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法律体系的完善必不可少。当下的政府已经注意到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进行,相互结合。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法治建设的速度过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政府应当调整针对其进行的立法步伐。在尚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推向社会的过程中,政府不应太过追求完备的配套法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给出法律框架,在设定法律红线后,对具体内容进行逐步完善,这样才可以保证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步调一致,相互作用。

与此同时,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要加强对相关活动的监管意识,避免使法律因为缺少主体而成为一纸空文。

结语

民主的运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化对于社会和制度的重要性,在考虑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为一个参考要素,而要考虑到其持续性和发展性,将其看作滋生一种社会氛围的土壤。

在这样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尽管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客观的社会环境还无法满足其在主观上的传播效率需求,但相信,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态一定可以极大推动我国民主社会构建的进程。